



街头涂鸦：创作还是捣蛋？

专家：厘清法律边界给合法涂鸦预留发展空间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前不久，网曝上海地铁11号线陈翔公路站，一男子用喷漆涂鸦车厢。视频显示，车厢壁有多处橘色涂鸦，广播提醒“请乘客们尽快下车”。拍摄者称，喷漆产生的气味导致车厢里味道刺鼻，列车暂时停运，乘客只能下车换乘。随后，上海地铁客服回应，此事已移交地铁公安处理。

无独有偶，某社交平台近日的一段视频显示，天津市河西区中石油桥一处路标下的柱子上，被人涂上“老坦”字样并标上右转弯标志。3月24日，《法治日报》记者前往中石油桥时看到，该处涂鸦已被人清除。记者联系到视频拍摄者，对方表示“老坦”是天津方言，指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人，带有“瞧不起”之意。

拍摄者告诉记者，从箭头方向一直走就出了市区，涂鸦的人摆明是想要挑起市区人和郊区人的对立。“原先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涂鸦，现在虽然少了，但隔段时间还是会看到，不过基本上出现很快就被清除了。”

近年来，因街头涂鸦造成的破坏市容市貌、扰民等问题屡见不鲜。街头涂鸦的边界在哪里？该如何规范这一行为？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网友分享涂鸦经历 合法性长期存争议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桥洞、栈道、站台底部等地，都是备受青睐的创作天地，有许多涂鸦爱好者和团队在上面分享自己的作品。

“我们偷偷去××涂鸦啦，因为会有人举报，城管会来，只好晚上偷偷来”“要在远一点的地方，不然很快就会被清除，留不了太久”……记者注意到，有博主分享了自己在30多个地方偷偷留下的涂鸦画作，并颇为得意地自称没有一次被处罚。

去年8月，网民张女士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反映，黄桷坪涂鸦艺术街周边涂鸦太过随意，市政设施、商业门面，甚至行道树都未能幸免，被涂鸦爱好者染得五颜六色。同时，颜料散发出的油漆味让人难受，希望通过问政平台得到解决。

但当地的商户严女士却有不同看法，她认为涂鸦街成了网红打卡点，为店铺带来了许多客流量。为此，她还专门在店铺外墙设立了一处涂鸦区，以吸引游客。

最终，黄桷坪街道办事处制定了解决措施，在兼顾游客的体验感和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情况下，设定了自由涂鸦区和禁止涂鸦区域，并安装相应的指示牌。同时，加强关于文明涂鸦的宣传，派出劝导人员引导游客规范涂鸦以及增加喇叭滚动播放警示音频。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文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马丽红介绍，涂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舶来品，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街头，自诞生伊始，就颇具争议。一方面，涂鸦艺术作为一种后现代边缘文化艺术，色彩跳跃，富有想象力和视觉冲击力，具有蓬勃的原创力和表现力，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街头涂鸦往往具有煽动性、暴力性、侮辱性或其他违法内容，而且通常是未经许可出现在私人建筑上，涉嫌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所以街头涂鸦作品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诟病。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在公共场合的建筑物上进行涂



《趁夜涂鸦》 漫画/高岳

鸦都是被禁止的。

“根据我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否则，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也就是说，原则上，我国城市是不允许随便涂鸦的，如果涂鸦影响市容市貌，或是在名胜古迹上乱刻乱画，还有在私人建筑上乱涂乱画，并对影响公众生活、市容的涂鸦行为缺乏有效的惩戒措施。”马丽红说。

有的破坏市容市貌 有的成为美丽风景

2022年7月12日，有市民发现，四川成都青羊区万花公园沙坑旁的一处墙壁上布满了涂鸦，并且这些涂鸦图案还带有骂人的英文，在涂鸦墙附近，是一处沙坑和儿童游乐设施，有多名小

孩在此玩耍。公园和内部设立的管理制度告示牌上，明确禁止在园区设施上进行刻画、涂污等行为。

工作人员称，这些涂鸦的人总是偷偷地来，很难逮到。涂鸦主要是用油漆喷涂的，墙面又是砂质，如果非要清除，只能将墙面重新粉刷，成本很高。

近年来，因街头涂鸦造成的破坏市容市貌、扰民等问题屡见不鲜，还有涂鸦者在公共平台声称，“以后哪里热门就涂哪里”。

辽宁瀛沈律师事务所律师赵春梅告诉记者，街头涂鸦成为城市顽疾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缺乏专门的城市管理条例等相关文件对涂鸦行为进行细致的管理、规定，例如在何种公共区域内允许涂鸦，何种涂鸦的表现形式是被允许在公共区域内进行创作和展示，二是市政部门对影响公众生活、市容的涂鸦行为缺乏有效的惩戒措施。

“创作者涂鸦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与情

绪，这种行为产生的结果可能与社会公共管理、城市功能规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城市管理等部门在文化包容、尊重艺术创作与规范涂鸦行为两者之间尚无有效的平衡措施与解决路径。”赵春梅说。

记者发现，并不是所有公共场所都禁止涂鸦，有些地方的涂鸦还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北京798艺术区的涂鸦从一开始就被接受，从过去到现在，整个区域内不但出现了制作精良的墙体涂鸦，而且还因此成了当地艺术家与中外参观者的聚集地。

许多地区街头的井盖变“景”盖，上面有志愿者、专业人员等画的垃圾分类、遵守文明、卡通形象等涂鸦画，用更直观、更新颖的方式去宣传垃圾分类、文明引导、“五治”等内容。

近日，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中华路街道西城壕社区邀请辖区单位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65名学子，到网红打卡点得胜桥区域，开展街头涂鸦快闪。

统一规划分类管理 包容合法涂鸦创作

在公共场所涂鸦，如何才能被法律法规所允许？

“民事主体行使权利应当不损害他人利益，在进行涂鸦时应当考虑是否存在可能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况。”赵春梅认为，涂鸦行为是否合法应结合该公共场所的区域功能定位确定，如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司法部门等严肃场合的外墙不适合涂鸦表达，涂鸦行为可以选择在公园或者艺术街区等轻松的场所进行；关于涂鸦的题材，如传播涉黄、暴力等都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有城管人员表示，按照规定，临街的公共场所是不允许进行涂鸦创作的。如果在小区内涂鸦创作，在没有纠纷的前提下，相关部门一般不会进行处理。如果是商业体，比如地铁等出入口，只要不触及法律红线，创作者与企业进行沟通后可以创作。如果确实要在临街公共场所的空间涂鸦创作，就需要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比如市民在路边看到的电箱被上了“涂鸦外衣”，都是经过相关单位批准后，按照统一风格进行设计的。

据了解，违法涂鸦的人一般会选择天黑或者偏远地区偷偷涂鸦，很难被抓到，即便涂鸦者被惩罚，后续的墙面复原和整治工作难度也很大。对违法涂鸦，如何才能有效治理？

赵春梅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对公共场所内的涂鸦区域进行统一规划、分类管理，对可以进行涂鸦的集中区域单独标识，并对墙面进行能够重复涂黄、易清除的技术处理，以便后期维护。

马丽红认为，要加大文明合法涂鸦的宣传力度，尤其是针对美院学生等人群，应进行必要的法治教育；对非法涂鸦的行为进行坚决查处，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此外，还要给合法涂鸦预留发展空间，比如在一些艺术空间，应允许涂鸦，满足涂鸦爱好者的创作需求。

“我国是一个倡导多元文化并存，强调文化自信的法治国度，涂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宜一概否定和抹杀，而应当纳入法治和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同时，也要探索和加强对合法涂鸦艺术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让涂鸦发挥其艺术价值，抑制其负面影响，彰显多元文化的魅力。”马丽红说。

村委会随意盖章致「奇葩证明」多发

江苏建湖检察建议督促整治「社区万能章」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王小刚 成诚

实践中，到村委会、居委会开证明是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事情，村居的印象也似乎是“万事皆可证明”，却有少数人“钻空子”开具虚假证明，骗过司法机关，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活动。

此前，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在日常办案中发现，有两起案件存在村委会超越职权出具虚假证明的情况。在依职权履行民事检察职责的同时，该院通过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方式推动辖区内“社区万能章”治理向深层次推进，为村级组织证明事项清理提供了思路和路径。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该检察建议人选江苏省2022年度优秀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不服判决申请检察监督 依法履职探索深层原因

2022年，建湖县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受理了两起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的监督申请。承办检察官在调阅卷宗后，发现这两起案件中均存在涉案当事人委托自己的“近亲属”作为诉讼代理人，且都由村委会出具了亲属关系证明。

村委会能不能出具亲属关系证明呢？承办检察官带着疑问，查阅文件资料并向相关当事人询问了解，前往所在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走访核实，对两份亲属关系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规范性进行全面调查，最终确认村委会不仅无权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且两起案件中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也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含义。

因村委会违规出具虚假亲属关系证明，法院仅进行形式审查，普通公民得以以近亲属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并到庭参与诉讼。根据走访调查结果，建湖县检察院立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强化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亲属关系的实质化审查判断。

长期以来，一些村级组织在社会事务管理、服务中随意盖章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出具各类“奇葩证明”，被群众戏称为“社区万能章”。2020年2月，民政部等六部委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并组织开展“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提出要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起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

这两起案件虽然是偶发现象，溯其根源却是暴露出自2020年以来当地“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中，村级组织证明事项清理仍有死角和盲区，而且在充分“放权赋能”的改革背景下，部分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法治理思维和法治意识还有待提升，印章加盖存在随意性。

“这两起案件中呈现出诉讼领域‘公民代理’行为变异，扰乱了诉讼秩序，损害了司法公正，更反映出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深层次问题，需要针对性开展深层次治理。”建湖县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杨生说。

制发检察建议溯源治理 规范证明事项减证便民

2022年3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部署开展民事诉讼深层次专项监督活动，明确要求分析研判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当地行政管理、诉讼治理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依法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为堵塞问题漏洞，促进溯源治理，建湖县检察院决定“多走一步”，于2022年6月22日向县民政局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提出了“开展‘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回头看’”等3条建议，建议下发负面清单、进行专门岗位培训，指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落实印章使用的审批、登记、备案制度等，进一步改进和规范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

收到该检察建议后，该县民政局立即牵头部署开展“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回头看”，形成工作方案，对专项治理活动进行再排查、再整治，上下联动，集中改进和规范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

整改期间，该县民政局还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通知》，压减和清理村级组织证明事项，明确入党政审证明、经常居住证明等“正面清单”14项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负面清单”20项，并规范证明式样，统一办理流程。

治理“社区万能章”，既要严格规范，又要简便便民。为此，该县利用“互联网+政务服务”功能，在智慧社区“掌上平台”开设“办事指南”栏目，对确有所需的群众给予正确帮助和引导，真正做到既简证又便民。

就在前不久，当地居民李某需要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根据网上所公示办事指南很快找到了有权出具证明的对应部门，在前往社区说明情况后，很快就办理好了相关业务。

“对确实需要在可开具范围内的证明，村居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经评估及群众协商，依法据实开具，避免出现管理和‘真空’状态。”建湖县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负责人何枫君介绍说。

协同督促确保落实到位 多部门协力探索新路径

“检察建议帮我们解决了头疼多年的盖章问题，什么证明能开，什么证明不能开，什么证明由什么部门开，现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方便了来办事的群众。”近日，建湖县近湖街道镇南村村委会主任朱仁河这样对前来的回访的检察官说道。

2022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机制牌子和证明事项的意见》，推动健全基层减负常态化机制，规范村级组织承担的工作事务，设立的工作机制、加挂的牌子、出具的证明事项。

借此契机，建湖县检察院增强检察建议整改实效，协同民政部门进一步清理纠正非法设定、非必要的证明事项。同时，该院干警与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共同以“四不两直”等方式下沉村居，实地回访并“抽查”证明事项清理情况，掌握整改实际效果，并在全县村（社区）“两委”成员主题轮训班上进行专题培训，实现村级组织出具证明工作长效管理。

该县还进一步联动强化村居公共法律服务，配齐村居法律顾问86名、“法律明白人”938名，为村居事务提供法律咨询、引导强化村居工作人员的法治理思维和法治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基层一线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村居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是否能依法办事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作为村居法律顾问，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当好村居的法治助手，让他们手中的印章不盖错。”建湖县钟庄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工作者、丁港村村居法律顾问何述明说。

“下一步，我们将对诉讼活动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证明进行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清理纠正，同时将进一步围绕办案推进数字治理，努力打破部门信息壁垒，畅通村级组织出具证明事项的信息核查渠道，努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真正将减证便民落到实处。”建湖县检察院检察长任汉军说。

杀妻后，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了妻子身上

揭开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背后不为人知的事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实习生 张若琦 □ 本报通讯员 阮隽峰

上海“杀妻冰柜藏尸案”曾一度震惊全国，案情很多细节在网络上已有大量报道，也勾勒出了杀人凶手朱晓东的性格轮廓：阴沉、残忍、自私和极端。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从一位法医口中再次回顾这个案件，听到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就是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法医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法医刘超，此前负责朱晓东的精神鉴定。

2017年2月13日，刘超在看守所见到了朱晓东，那时距离他杀人已近4个月了。

“他见面就告诉我们，妻子杨某某脾气很差，用上海话讲，就是非常‘作’，小心眼、太计较，且报复心强。”刘超说。

在与法医的沟通中，朱晓东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了杨某某身上。因为他明白妻子此时早已无法辩解。“有时候她给我发微信，我没回，晚上回家就发脾气，还有，晚上我加班很晚，就必须得半个小时给她发一张办公室照片，否则也要发脾气……”家里买个面包机不如她意也跟我吵，吵到要离婚为止，但我一说同意离婚，她又说只要离婚她就自杀。”朱晓东向刘超如此描述，在他口中杨某某就是一个蛮不讲理、令人讨厌的“上海小女人”。

据此前媒体报道，朱晓东杀妻源于夫妻二人不愉快的杭州之旅。

而面对刘超，朱晓东又是这样描述的：“去之前，因为我早上起晚了，没在网上抢到她想住的酒店，她就大发脾气，在杭州那几天一直不停地念叨这件事。回来时，又因为没有买到高铁票，只能坐卧铺回来，她就一直唠叨，晚上都哄好了，第二天起来又开始抱怨。”

朱晓东说，案发那天早上，他实在受不了杨某某的喋喋不休，就掐住了她的脖子。“我只想让她闭嘴，没想杀死她。”朱晓东向刘超强调。

可见妻子已没了呼吸，朱晓东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完了。于是他决定，与其束手就擒，不如一个人先好好享受一番。

他将杨某某的尸体藏在冰柜中，把她支付宝里的4万多元转到自己账户里，然后打包行李出去旅游了。近3个月的时间里，朱晓东去了海南、徐州、韩国等地，先后以杨某某的名义在手机上借了大约16万元用于花销，至于杨某某父母和朋友发来的微信，他都悄悄“代劳”回复了。

“如果是电话，我就挂了，就不方便接听。”朱晓东说。

2017年2月1号是杨某某父亲60岁的生日，杨父给他们发来邀请微信，约好让他夫妻二人来吃晚饭，但过了约定时间，杨父迟迟没有

等到女儿女婿到来，同时发现再也联系不上女儿了。

朱晓东知道事情瞒不住了，就打电话给自己父母，坦白了杀妻事实，然后在父母的陪同下到派出所自首。

“杨某某在世时，你有没有背着她和别的异性接触并发生性关系？”刘超问朱晓东。

“有接触，但没有发生性关系。”朱晓东回答。

然而，这显然是在说谎，因为根据警方查证，朱晓东此前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

他的陈述有多少可信？从看守所出来，刘超去拜访了杨某某父母和朱晓东父母。

朱晓东父母在他11岁时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生活，从小在溺爱中长大。朱晓东母亲告诉刘超，儿子从小就话少，不好亲近，如果和他聊天，他只会回答“是”或“不是”。

更重要的是，从与朱晓东母亲的谈话中，刘超发现，朱晓东性格有极端倾向。“他母亲说之前他和异性发生情感纠葛时曾割过腕。”刘超说。

杨某某的父母后来也向刘超证实，对于这个接触不多的女婿，他们的印象是“话少、内向”，从女儿带他来见父母到案发其实不到一年，杨父母与朱晓东的接触并不多。

某有点“作”之外，并无异常。

按照常理讲，夫妻间难免有摩擦，简单一个“作”字就对妻子痛下杀手，确实难以自圆其说，但案发当天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朱晓东杀妻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如他所说，“只是想让她闭嘴”？

冰柜里的杨某某已无从诉说，朱晓东的辩解在证据面前又显得如此苍白。经过走访调查，刘超认为朱晓东并无精神问题，更没有精神疾病。刘超又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包括人格测验。

刘超从事法医职业已有10年。他告诉记者，从鉴定的角度来讲，朱晓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说谎者。“做人格测验的时候很明显，他有自我保护意识，倾向于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答案，没有说实话。”刘超说，人格测验由几百道题组成，题目构成经过缜密设计，如果是刻意说谎，在专业的法医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两个月后，刘超向警方提供了鉴定意见：朱晓东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有受审能力。

2018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朱晓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朱晓东随后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19年7月5日，上海高院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0年6月4日，上海二中院对朱晓东执行了死刑。